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中的空间建构*

于 杰**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空间反映论，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分析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中文本故事空间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从女奴叙事和黑人女性作家文艺复兴这两个重要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阶段中选取代表作品作为文本分析的基础，区分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中构建的三种叙述空间：受歧视的感知空间、被奴役的构想空间和受压迫与进行反抗的生活空间。这三种空间分别反映了美国社会中权力和空间分配过程中存在的种族歧视、黑人女性精神追求受白人审美观和美国梦的奴役束缚以及这类群体受男权压迫并进行抗争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生活的空间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patial refle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cial realities reflected by the textual story space in American black femal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febvre's space triad. The texts for literary analysis are selected from the most significant peri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black female literature, namely slave narratives and black women writers' renaissance. Three narrative spaces are constructed in American black female literature: the perceived space of discrimination, the conceived space of enslavement, the lived space of o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These three spaces reflect the corresponding realities in American society: racism exist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space; 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black women is bound by the White's aesthetic standard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lack women are under the control of patriarchy and try various means to fight against it.

Key words: American black female literature; perceived space; conceived space; lived space

* [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的时空叙事研究”（15YJA752018）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天津市高校“中青年骨干创新人才培养计划”（043/135305JF52）的资助。

** [作者简介]：于杰，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叙述学研究。

20 世纪末叶的“空间转向”成为学术界的新气象,学者们纷纷聚焦“空间性”探讨。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 1926—1984)、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和爱德华·W. 索亚(Edward W. Soja, 1941—)是空间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福柯提出了空间、知识、权力三位一体,从权力入手将现代社会描述为规训社会,在讲述权力概念时引入了空间范畴,他的着眼点在于探讨权力话语的空间构型(configuration)对现代人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王弋璇 358);列斐伏尔辨析了空间的理念,将空间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指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以空间性为存在方式,社会过程透过空间而运作,空间是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的建构过程,他创造性地把空间总结为三个维度,构建了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成为其社会空间理论的核心内容;索亚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包括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西方后现代语境中出现的空间和地理学转向。这三位学者在空间理论上的建树虽各有侧重,但都具有空间表意研究之本质。即便是空间形式研究,也是注重形式与主题的结合,探索形式化意义。对于空间参与社会现实的程度,空间研究者持不同态度,概括起来有两类。第一类持空间反映论,认为空间反映社会文化;第二类比较激进,认为空间及空间政治结构表达社会关系,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关系。空间关系能够推动甚至决定社会变革(赵莉华 6—7)。本文立足于空间反映论,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分析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中文本故事空间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选取的文本涵盖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中两个显著时期的代表作:首位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开创女奴叙事先河的哈里雅特·威尔逊(Harriet E. Wilson, 1825—1900)所著的《我们黑人——一个自由黑人的生活写照》(*Our Nig: Or, Sketches from the Life of a Free Black*, 1859)^①、黑人女性作家文艺复兴时期^②优秀女作家葆拉·马歇尔(Paule Marshall, 1929—2019)的《褐姑娘,褐砖房》(*Brown Girl, Brownstones*, 1959)、领军人物之一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 1944—)所著的《紫颜色》(*The Color Purple*, 1982)以及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所著的《最蓝的眼睛》

① 下文将简称为《我们黑人》。

② Deirdre J. Raynor 和 Johnella E. Butler 在“Morrison and the Critical Community”一文中提出了“黑人女性作家文艺复兴”这一术语。

(*The Bluest Eye*, 1970)和《秀拉》(*Sula*, 1973)。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批判了传统认识论上的二元论方法,他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1)中提出了一个“三元组合概念”:“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及“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并将空间划分为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Lefebvre 33)。根据列斐伏尔对空间概念的分析与类型划分,本文区分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中构建的三种叙述空间:充满歧视的感知空间、受奴役的构想空间以及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生活空间。

一、感知的空间:令人窒息的 黑屋子和底层社区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物质属性,但绝不是与人类、人类实践和社会关系毫不相干的物质存在,反之正因为人涉足其间,空间对我们才具有意义。“感知的空间”是列斐伏尔划分的第一种空间,这是一种具体化的、社会生产的、经验的空间,它直接可感,并在一定范围内可进行准确测量与描绘。这是传统空间学科关注的焦点。在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里,黑人处于从属地位;而在男性霸权的社会中,性别的二元对立思维导致了社会空间的等级分配,男性占据支配性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则属于女性。而受性别、种族和阶级等决定性因素的影响,黑人女性处于美国社会的最底层,遭受歧视、屈辱与压迫。美国黑人女性作家为了反映这一特殊群体所处的社会境况,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了具体的感知空间,让读者犹如临其境,真切地体会到黑人女性被分配到的社会空间。

威尔逊在《我们黑人》中以对话和场景描写的方式叙述了黑人契约女奴弗雷多所分配到的居住空间:黑女奴的住所要穿过一段漆黑的过道,然后爬梯子。“天还不是很黑,即便没有灯光,也能爬上楼梯,他们经过了几个房间,装饰相当华丽,让这个孩子惊诧不已。他推开了连着弗雷多房间的 door,中间是一段非常黑,而且没有竣工的过道。‘别碰到头,’杰克说,一边走上前去打开弗雷多住处的门——建在厨房顶上的一间屋子,屋子还没有盖完,屋顶一直倾斜到地板上,床只能摆在屋子的中间。光线和空气

从一个小窗户中透进来。杰克回到客厅时,说这个孩子不久就会长得比那间屋子还要高”(Wilson 17)。^① 贝尔蒙夫人让弗雷多居住的地方有三个特点:第一,方位上的边缘性。这个屋子建在厨房顶上,从用途来讲,原本并不是用作卧室的,也许是想作为储藏室;从方位上看,这间屋子并不是和房子中的其他房间处在同一平面上,是高出其他房间的一处空间,这一边缘方位具有特殊的表征意义,旨在向读者说明这间屋子是多余的,并不是用来住人的,把这样的屋子分配给弗雷多,说明了黑女奴在白人家里的地位本身是多余的。第二,屋子具有危险性,因为这间屋子尚未竣工,屋顶只搭建了一半,剩下的倾斜到地板上,如果天气恶劣的话,例如刮风下雨,随时有坍塌的可能性;而且通向这间屋子的过道很黑,没有灯光,只能借助月光看路,屋子也没有竣工,另外还需要爬一段梯子才能到达,可以想象如果月缺天黑时,黑女奴在走进屋子的过程中,会有撞墙、甚至摔下梯子的危险。第三,屋子狭小闭塞,由于屋顶倾斜到地板上,只能把床摆放在中间,杰克告诉妈妈:这个孩子很快就超过屋子的高度,黑女奴现在只有6岁,一般来说身高有1米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屋子的高度有1米多一点,平面面积也非常有限,仅能在中间摆一张床,估计有5平方米左右;屋子只有一个小窗户,是透进空气和月光的地方,这样的建筑不禁使读者联想到监狱,封闭狭小的空间用来禁锢黑女奴的身体自由。作者在描写黑女奴被分配到的物理空间时,虽然只用了5句话,叙述非常简短朴实,但用这种具有边缘性、危险性和狭小封闭性的空间意象揭示了黑女奴的社会空间。她们的卑微身份不配居住与白人同样的房间,能有这样的小黑屋住已经不错了。作者故意描写了白人主人居住的房间和黑女奴住处的差别之大,一个是装饰华丽,另一个是简陋危险,黑女奴看到白人的房间表现出来的那种诧异从某种程度上揭露了奴隶制下白人与黑人之间地位的悬殊,白人奴隶主拥有一切物质享受,占据最豪华的社会空间;而黑奴不被当人看待,拥有狭小的栖身之处已经算是白人施舍的恩惠了。

莫里森的《秀拉》描写了获得自由身份后黑人们的生活情况,夏娃、汉娜和秀拉祖孙三代黑人女性居住在名为“底层”(Bottom)的黑人社区。关于这一地名的来历,作者在小说的最开始交代这是“一个拿黑鬼开心的玩笑”,黑奴完成了白人农场主交给他的活,向白人要求一块地,白人不想放弃任何土地,便把山顶给了黑奴。“‘可是那是在高高的山顶上啊。’黑奴

① 引文由本文作者自译。

说。‘从我们这里看是高高在上，’主人说，‘可是当上帝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低地啦。所以我们才这么叫啊。那是天堂的底层——有着最好的土地呢’”(莫里森 2005a: 138)。从“底层”命名的故事当中，读者可以悟出白人欺骗黑人、颠倒是非的真实面目。列斐伏尔指出社会性是空间的本质属性，空间并非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赵罗英 37)。白人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黑人原本隶属于白人，是白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即使获得了人身自由，在社会关系中仍然处于被动、附属的角色。故事中的黑人要求白人履行诺言，但是白人是不会舍弃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白人随口编了一个谎言。从谎言的内容来看，白人利用上帝，即利用宗教来愚弄黑人，颠倒是非，把好的生产资料留为己用，而把劣质的土地分给黑人，美其名曰上帝的恩惠。由此可见，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着生产资料的分配，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白人始终控制着一切生产资料，黑人在社会中不可能改变受歧视、受压迫的地位，他们所分配到的社会空间、生产资料总是劣质的。“底层”的命名故事揭露了黑人受歧视的社会地位以及白人的欺骗性本质。

列斐伏尔指出要揭示感知空间所隐含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解码(deciphering)来进行(Lefebvre 38)。王影君在分析列斐伏尔的空间经济性时，指出空间具有生产能力，以此让人们能够更加明显地看到不同空间之间彼此的对立、对抗与融合(195)。通过对上述文本的解码，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黑女奴居住的小黑屋，还是获得自由后的黑人女性居住的“底层”黑人社区，都令人感到窒息，是社会空间中最劣质的部分，这种感知的空间反映了美国社会中权力、空间分配过程中存在的种族对立和对抗。

二、构想的空间：魅力无穷的 蓝眼睛和褐砖房

构想的空间是概念化的空间，它是科学家、规划家、城市学家和分门别类的专家、政要的空间。构想的空间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建构自己空间秩序的过程。这种空间秩序生产出相应的空间语言符号系统，并通过控制空间的知识体系成为一种隐性的空间权力，干预并控制着现实的空间

建构(Lefebvre 38—39)。《最蓝的眼睛》中黑女孩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以及《褐姑娘,褐砖房》中西拉对褐砖房的向往反映了黑人女性如何努力生产出相应的空间符号来搭建构想的空间,以此改变现实世界中的空间建构。

佩科拉从小缺少家庭的关爱,家庭给予她的感觉只有恐惧和嫌弃。父亲和母亲整日争吵打架,哥哥山姆可以离家出走,可是佩科拉只能忍受内心的恐惧。不仅如此,在学校里她还经常受到同学们和老师的欺负与鄙视。“她是班上唯一单独使用双人课桌的人。[……]她还知道当学校里的女孩子想要污辱某个男孩儿,或想听他当时的反应时,她只需说‘鲍布喜欢佩科拉!’就会引起四周听见此话的人的一连串的嬉笑声以及被嘲弄者的咒骂声”(莫里森 2005b: 29)。

佩科拉把这一切的不幸归因为自己长相丑陋。她幻想自己能有双美丽的眼睛,这样爸爸妈妈就会喜欢她。“每到夜晚,她就乞求得到蓝眼睛,从不间断。她充满激情地祈祷了整整一年。尽管多少有些失望,她并未丧失信心。要想得到如此珍贵的东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同上 30)。由于对“蓝眼睛”渴求的心理越来越强烈,佩科拉最后到皂头牧师那里求助,皂头牧师施用魔法,借助上帝的力量帮助佩科拉实现了愿望。

但是愿望得到实现之后,佩科拉的命运却愈加悲惨:她遭到了父亲的强暴,母亲发现后,不但没有谴责父亲,还狠狠地打了佩科拉。后来佩科拉怀上了父亲的孩子,更遭到周围人的议论和唾弃。“人们窃窃私语,摇头咋舌。……大人们扭头不看她;胆大的孩子大声嘲笑她”(同上 133)。最后佩科拉精神失常,呈疯癫状态,整日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她的朋友克劳迪娅和弗里达作为旁观者,审视了佩科拉的悲剧,认为:“一个黑人小女孩儿期盼得到白人女孩儿的蓝眼睛。这种愿望着实可怕,但是愿望得以实现更为罪恶。……她受的伤害是彻底的”(同上)。

高继海在分析佩科拉的悲剧原因时总结了三方面:种族歧视的历史根源、缺乏父母关爱的家庭原因、佩科拉本人懦弱的自身原因(79—81)。笔者认为佩科拉的悲剧根源在于她企图用白人的审美标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白人认为“黑色是丑的”,不仅如此,受后殖民主义教化后的多数黑人也这样认为。好莱坞女星秀兰·邓波儿以美貌赢得了全世界无数小女孩的羡慕与崇拜,她的头像被印制在各种日常用品上。佩科拉认为如果拥有像邓波儿那样漂亮的蓝眼睛,就可以赢得周围人的爱。因此她日夜幻想获得这样的蓝眼睛,为此虔诚地祈祷。在佩科拉构想的蓝眼睛空间

里,起统治作用的是白人的审美观,黑女孩的幻想服从了白人的审美观,是受其精神奴役的结果,即便是她的幻想变为现实后,仍然摆脱不了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也无法避免黑人女性遭到男性侵袭的性别劣势。

葆拉·马歇尔在《褐姑娘,褐砖房》中塑造了西拉这位鲜明独特的黑人妇女形象,女主人公自幼在巴巴多斯历尽辛酸,对家乡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她逃离了家乡的新奴隶体制,来到了白人至上的美国,面对社会的种族歧视,她没有选择逃避和谴责,而是决定用自己的劳动来突破社会赋予黑人的狭小空间,努力争取自己想要得到的社会空间。她试图通过自己的坚韧来弱化种族因素,她曾这样说:“我们以前给犹太人擦地板,他并不是因为我们是黑人才欺压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每次我跪在地上擦地板时,就对自己说:‘上帝,让我做得更好些,让我站起来。’不,权力其实和肤色没有关系……几年前白人也让自己的孩子到煤坑和血汗工厂去劳作。非洲的兔崽子们把我们赤裸裸地卖掉[……]人们要找到自己往上爬的途径,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在设法稳固自己的位置。这个世界不可能总是属于白人的,也许会被其他人接替,也许这些人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大多数人要吃苦受累才能得到这一切”(Marshall 224—225)。^① 西拉所构想的社会空间是要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褐砖房,目前一家人居住的褐砖房是租赁的,而西拉想把它买下来变为自己的财产。

申昌英指出:“西拉几乎全盘接受了白人主流社会‘向钱看’的原则,有意无意地忘却了美国社会鲜明的种族性。在‘只要你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国梦的麻痹中,她正好落入了白人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圈套”(96)。坎蒂丝·匹兹(Candice A. Pitts)指出美国黑人长期与种族歧视斗争,为的是在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中重新寻找和界定自己的位置,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归属感的寻找就是通过得到物理空间和财产得以实现(Pitts 166)。以购买褐砖房为实例,小说中西拉为了购买一栋褐砖房,获得自我构想的空间,设计卖掉了丈夫戴顿的土地,想用这 900 多美元支付房子的首付款。她构想的计划打碎了戴顿在家乡比姆郡建造白色房子的梦想。为了报复西拉的不择手段,戴顿一天花光了所有的钱。西拉一气之下向警方告发丈夫非法移民,导致戴顿被遣送回巴巴多斯。在临近巴巴多斯的地方,戴顿跳海自杀,因此西拉对丈夫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的奋斗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不择手段,她再也没有年轻时的“羞涩和

^① 引文为本文作者自译。

美丽”，再也回不到相亲相爱时的家庭照片里的那个她。虽然最终西拉买下了褐砖房，但是丈夫已经不在，两个女儿也要离开她：伊娜要出嫁，赛琳娜要回到家乡比姆郡。从这个结局看，黑人女性面对社会现实所构想的个人空间最终变为一个空壳，一个记载着她抛弃亲情、背弃自我和民族文化传统的空间，而历尽千辛万苦得到的个人空间即将在城市新规划中消失。西拉是个悲剧式的人物，玛丽·海伦·华盛顿（Mary Helen Washington）认为西拉是整部小说中最大的受害者。她为家庭所做的努力没有得到任何成员的感激和认可，反而让丈夫和女儿感到压抑。她所构想的空间最终在城市新规划中即将消失，亲人的离去和空间的倒塌象征了黑人女性在种族歧视的社会空间里所做努力的失败与徒劳（Washington 313）。

列斐伏尔指出构想的空间是抽象的，但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然而这一构想空间中的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迟早会破裂，其原因在于两者之间缺乏统一性（consistency）（Lefebvre 41）。反映在上述作品中，黑女孩对蓝眼睛的幻想与渴望以及移民到美国的黑人女性对褐砖房的向往与决心属于构想空间中的客体，佩科拉和西拉是承载这一客体的主体，两者之间关系的决裂在于她们的构想脱离了社会现实，她们企图通过构想与白人接近的社会空间来改变自己受歧视的命运，但是这种生产出来的空间符号根本无法撼动现实的生产关系，白人仍然占据社会统治地位，黑人仍然处于被动、服从的社会空间位置，因此试图用白人的思想观念改变自己命运的空间构想只能加剧黑人女性命运的悲剧性。

三、生活的空间：禁锢自由的厨房和家园

生活的空间是指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视野中的想象和虚构空间、各自象征性的空间。它是一个被动体验或屈服的空间，是被想象力改变和占有的空间。与构想的空间不同，生活的空间是一个被统治的空间，也是为了斗争、自由与解放而选择的空間。列斐伏尔将其称为一个反空间（counter-space）领域。这种反抗体现在他对从属的、外围的和边缘化空间的再现和对处于空间秩序的社会底层的关注。这种空间存在于精神和身体的物理存在之中，存在于性别和主体性之中，存在于从地方到全球的一切个人和集体的身份之中。它们是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斗争的空间（Soja 68）。《褐姑娘，褐砖房》中西拉的所属空间——厨房和《紫颜色》中西丽的

生活空间——家园,既是被男性统治的空间,同时也是黑人女性争取自由与解放自我的斗争空间。

西拉构想的空间是一栋属于自己的褐砖房,在整栋褐砖房中,她实际生活的空间只是那间冰冷的白色厨房。厨房统治了西拉的家庭活动,成为黑人女性服务家庭、屈从于男权的“服务空间”(space of service)。西拉首次在小说中出现的地点就是厨房,一副家庭妇女的形象,面无表情地劳动,“妻子从容地站在厨房的水槽前,[……]西拉只是把手抠进正在清洗的鸡内脏中,使劲扭动并拽出了黏糊糊的、土黄色的消化道,扔进了污水池”(Marshall 22—24)。西拉对鳕鱼的臭味以及房屋居住条件的恶劣已经见怪不怪,也没有精力注意站在一旁的丈夫的身体行为和心理活动;而作为一家之主的戴顿除了在自己悠闲的所属空间——玻璃阳房(sun parlor)里享受穿着打扮带给他的愉悦心情,对败坏他体面形象的味道大惊小怪,见到妻子辛苦劳作的场景不但不帮忙,反而在妻子的所属空间对其进行意淫。“他在水槽上方的镜子中瞥见了妻子的脸:坚毅的嘴唇、宽鼻翼、深黑色皮肤下结实而漂亮的骨架——其实他并不希望妻子身体中透出的那种硬质的因素。他想象妻子的皮肤在炎热的夏日中一定是凉爽的,突然他萌发了想摸一摸的想法。她两腿间几乎没有什么缝隙,虽然已经生育了3个孩子,身材还像个姑娘,他真想一下子就插入她的身体。也许今晚就非常合适”(同上)。西拉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虽然表现一贯强势,但有时在男权的入侵下也会手足无措。尽管她背着丈夫偷卖了土地,戴顿仍然能靠犹大式的笑容和话语(a Judas smile and Judas words)这种男性魅力来迷惑西拉,骗出现金,在一天之内到纽约的第五大街(the Fifth Avenue)把卖地的钱全部挥霍掉,并在夜深人静时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冲进厨房、甩开杯盘、扯掉桌布,瞬间把西拉的功能空间变成一个“狂欢场所”,以此报复她的不择手段、嘲讽她存钱买房的徒劳,同时也痛快地侵占了西拉的生活空间。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景,西拉目光茫然,呆立在厨房的门口,半天才晃悠到餐桌旁,摸索着坐在椅子上,最后发出了愤怒的嚎叫,打破了房间的宁静,但是她欲哭无泪。这一场景凸显了戴顿和西拉的空间张力,间接地揭露了西拉因为性别劣势而表现出的无奈与无助(申昌英 96)。

小说中还有一处叙述西拉在厨房里的场景:“一个炎热的夏日星期天,家庭中的其他成员都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戴顿在玻璃阳房里睡觉[……];伊娜在弹钢琴[……];赛琳娜无聊地在房子里乱窜[……]她最后

来到妈妈呆的厨房。妈妈是家里唯一一位没有被周日懒散而传染的成员,赛琳娜走进厨房时,敬佩之意油然而生。只见妈妈坐在那里,冷静而警觉,从窗栅栏里照进来的阳光把妈妈罩住,她拿着报纸,离自己的身体远一些,好像来自欧洲战场的消息会玷污了她似的”(Marshall 51—53)。周日本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西拉仍然待在厨房里,即使不做饭,她也坐在厨房里,而且被照进来的阳光禁锢着(caged);别人在休息和放松,她依然保持清醒和警觉的状态。这种空间的归属感是男权社会施加给女人的,女人就应该牺牲自己,服务于家庭,服务于男性。从这一层面上分析,黑人女性在其生活的空间内是从属于家庭的、屈从于男权的淫威。而黑人男性尽管在外面四处碰壁、一无是处,但是回到家中仍然可以安详自得地当甩手掌柜,以大男子主义的姿态来维持男性的尊严、侵占并统治女性的生活空间。

厨房虽然是统治女性的生活空间,但另一方面也是西拉决定家庭事务、参与社区活动的中心,是黑人女性摆脱家庭束缚、反抗社会歧视的反空间(counter-space)领域。为了买房子,西拉费尽心思,终于在计划即将成功的时候,在厨房对丈夫和孩子们公开了自己的决定和所作所为。

“我已经卖掉了土地。”“西拉,没有空开玩笑啊。”“玩笑!我卖掉了,我告诉过你的。”[……]西拉把自己怎样伪装戴顿的身份和他姐姐通信,然后模仿丈夫签名的前后经过告诉了戴顿。[……]最后西拉告诉戴顿:“周一我们拿着这些材料一起去纽约的银行,把现金兑换出来。你听到了吗?周一来啊。”(同上 114—116)

面对一事无成的丈夫,西拉必须支撑起这个家庭,为了在社会上立稳脚跟,她努力干活赚钱,要实现在纽约买一栋褐砖房的梦想。面对继承土地这一突如其来的好运,她和丈夫争吵不休,她坚决要把土地卖掉,偿付房子的首付款;而戴顿始终坚持说自己继承的土地,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西拉可以容忍丈夫的一事无成,乱花钱,在外面嫖女人;但是在决定自己构想的空间是否成功的问题上,她决不让步,甚至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在自己的所属空间向全家宣告了自己的行为,以此来彰显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西拉不仅把厨房当作自己处理家庭事务的空间,还让自己的生活空间成为参与社区事务和对社会发表看法的场所。迈克尔·科布(Michael L. Cobb)指出西拉在《褐姑娘,褐砖房》中利用自己的

巴巴多斯方言解构了白人世界的宗教权威,将宗教表达转换成了黑人表达方式,她突破种族定式,大声疾呼“*Oh Lord*”,而非使用基督教惯用的“*My God*”这样尊敬称呼,这种语言上的宗教亵渎式顿呼,一方面加强了黑人女性对社会不公的抱怨语气,另一方面也展现了黑人女性不拘俗白的反抗精神(Cobb 631—635)。

美国文学中的黑人妇女总是被妖魔化——她们肥胖的身躯、超强的生育力总是用来象征野性和低贱,被剥夺了最起码的尊严和自我(嵇敏 16)。但葆拉·马歇尔笔下的这些黑人妇女是有思想的,她们不甘心在生活空间中仅仅充当服务家庭、服务男人的从属形象,她们努力用自己的劳动和有见解的声音争取自由与解放,向这个白人/男人的社会宣布自己的权威。文学作品中出现这种新型的黑人女性形象,是受 19 世纪中后期萌发的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黑人女性生活的空间也是她们争取自由与解放自我的斗争空间。

沃克的《紫颜色》揭示了黑人妇女西丽遭受父/夫权、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凄惨状况。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西丽所遭受的压迫是双重的:既要承受来自外部——种族歧视的压力,又要背负来自内部——性别歧视的欺辱。来自社会、家庭以及自我精神上的各种压力都在日益剥夺着她的精神自由并毁坏她的自我完整(乔国强 39)。家园是西丽的生活空间,但在儿时的家中,她遭到了继父的强暴,怀孕后被迫中止上学,然后以陪送一头牛的代价被继父嫁给了丈夫某某先生。在婚后的家中,其一,她沦为丈夫的泄欲工具以及照看孩子做家务的机器。其二,她还要下地干活,也就是说,西丽在这个家里既要承担全部女人该做的活儿,还要和男人一起干本应只属于男人的工作。其三,西丽还要忍受男性的暴力。某某先生对她动辄拳脚相向:“他揍我就跟揍孩子一样。只是他不大揍孩子。他说,西丽,把皮带拿来。孩子们都在门外扒着门缝偷看。我拼命忍着不哭。我把自己变成木头,我对自己说,西丽,你是棵树。我就这样知道了树是怕人的”(沃克 23)。其四,西丽的一切行动必须听从丈夫的,某某先生给她规定了许多禁令。家里的邮箱只能由丈夫打开,西丽只能远远地看着,不知道丈夫取出的信件是否来自耐蒂。这也能说明近 30 年间耐蒂写给西丽的信为什么会石沉大海。莎格邀请西丽去酒吧听她唱歌时,遭到了某某先生的禁止,他说“女人不该去这样的地方”。最后在莎格据理力争下,他才被迫同意。后来,莎格告诉某某先生要带西丽一起去孟菲斯,“某某先生的脑袋猛地转了过来。你说什么?……休想,除非我死

了,某某先生说”(同上 174)。

上述的描写有力地证明了黑人女性生活空间的闭塞。她们从小到大没有爱,没有自由,生活在父权、夫权的掌控之下,她们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家里,不能外出上学,不能外出参加社交活动。她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是属于男人的,被男人当作性工具;她们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否则只能挨打;她们不停地劳动,还被无辜地责骂,遭到与事实不符的非议。“家园”这一原本美好的空间被笼罩上了厚厚的阴影,对于黑人女性而言,“家园”不是充满爱的幸福之地,而是充满暴力和恐惧,被剥夺权利、禁锢自由的牢狱。

但是,西丽对于自己沦为性工具、劳动机器、家暴对象的悲惨命运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采取了隐忍的策略。耐蒂住在西丽家里的时候,看不惯某某先生和他那些孩子们对西丽的摆布,鼓动西丽反抗:“你得斗争。”西丽答道:“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斗争,我只知道怎么活着不死。”从小生活在男权的淫威下,西丽不懂得、也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斗争,势单力薄的她认为自己的存活就是一种隐性的斗争策略。后来,某某先生的一个妹妹凯特来他们家,非常同情西丽的境地,提议哥哥给妻子买点衣服,某某先生却说:“她还要衣服?”凯特带西丽去商店买了布料,给她做了人生中的第一件新衣服;还教育哈波帮西丽一起干活,得到的回答是:“女人才干活嘛。我是个男人。”凯特走之前对西丽流着泪说:“你得跟他们斗,我不能替你干。你得自己跟他们斗。”西丽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我没说话。我想到耐蒂,她死了。她斗过,她逃跑了。可这又有什么好处?我不斗,我安分守己。可我活着”(同上 21—22)。在乱伦的继父、施暴的丈夫掌控的家园中,西丽没有人身自由,只有忍气吞声,她不敢有语言或行为上的反抗。她把所有的委屈和心事都告诉上帝,通过写信的方式,来倾诉自己的所有不幸。沃克让黑人女性采取书写的叙述策略,迂回地达到控诉男性霸权的目的,从这个层面上分析,西丽在其生活的空间中采取的隐忍做法,是一种无声的斗争策略。

莎格要带西丽去孟菲斯,某某先生刻意贬损西丽,把她说得一无是处,但是西丽无需自己辩解。作者故意安排某某先生的哥哥和妹妹,让他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公正地对西丽做出了评判。“他的两个妹妹来看我们。她们都穿戴得整整齐齐的。西丽,她们说,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不该说死人的坏话,一个妹妹说,不过讲事实不是说人坏话。安妮·朱莉亚实在不是个会持家过日子的女人”(同上 19)。

某某先生的亲妹妹对西丽的评价是肯定的,认为她比第一任嫂子会收拾家,这使得某某先生对西丽的指控不攻自破。莎格生病后住在某某先生家里,他的父亲来告诫儿子不许他继续和莎格交往,否则就要收回这儿的房子和地。后来某某先生的哥哥又来劝阻,当时西丽和索菲亚正在一起缝制百纳被,哥哥对西丽说:“你总是忙,总是闲不着。我真希望玛格丽特像你一样。可以省我好些钱。”过了一会儿又对某某先生说:“她比玛格丽特能耐多了,玛格丽特要是拿起针线的话,她会吧针插到别处,把你的鼻孔缝了起来”(同上 52—53)。某某先生把西丽贬得一无是处,可是自己的亲哥哥却道出了西丽心灵手巧的优点。沃克别具匠心地安排旁观者进行评价,让他们替西丽辩解,指出继父、丈夫强加给西丽头上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虽然主人公隐忍不发,但是旁观者已经看不下去了。这种“他说”的叙述策略也是女性斗争、争取权利的一种方式。布伦特·塞西斯·坦瑞泰尼尔(Bulent Cercis Tanritanir)等也指出在西丽被继父和丈夫禁止发声(silence)后,其他女人替她发声,为她争取权利。某某先生的妹妹凯特告诉哥哥西丽需要一件新裙子,而西丽不敢讲出自己的这一基本需求,在她内心深处,某某先生把自己当作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it),而不是人,她就像个需要换地毯的一个地板一样。当西丽央求莎格继续待在自己家时,莎格才知道只要自己离开,某某先生就会殴打西丽,也因此扭转了自己的立场,转而维护西丽的利益(Tanritanir & Boynukara 284)。

列斐伏尔在比较构想的空间和生活的空间时指出:前者的主、客体之间缺乏连贯性(coherence),因此以悲剧收场,而后者则相反,因为生活的空间是鲜活的(alive),在场的主体获得了主体意识,例如西拉的宣告决策和西丽的书写隐忍;同时生活的空间是情感的中心(affective kernel or center),经常是以自我(Ego)和居所(dwelling)为代表,例如上述作品中厨房是西拉凸显自我权威的场所、在饱受迫害的家园里西丽以自己的隐忍赢得了姐妹的情感支持。总之,生活的空间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揭露了黑人女性遭受男权的压迫,同时也彰显了她们通过努力、坚毅和隐忍、同性团结的策略争取解放和进行反抗的精神。

结 语

索亚指出:列斐伏尔的三个空间强调了被统治、服从和反抗的关系(Soja 68)。在感知空间里,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白人手中,黑人女性分配

到的社会空间永远是最劣质的,这种空间经济特性揭示了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劣根性;构想的空间是一个服从的空间,黑女孩对蓝眼睛的幻想服从了白人的审美观,移民到美国的黑人女性对褐砖房的向往与决心服从了白人的价值观,这种精神奴役和空间枷锁在白人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现实中只能让其构想幻灭。然而生活的空间具有双重意义:尽管黑人女性的生活空间是服务男权、听从男权摆布的被统治的空间,这一禁锢其身体和思想自由的生活空间揭示了黑人女性遭受性别歧视的社会现实;然而这一印证黑人女性悲剧命运的生活空间同时还成为她们争取自由和获得解放的反空间,黑人女性作家通过“发声”“书写”及“她说”的叙述策略彰显了黑人女性的独特权威。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Cobb, Michael L. "Irreverent Authority: Religious Apostrophe and the Fiction of Blackness in Paule Marshall's *Brown Girl, Brownston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72. 2(2003): 631 - 648.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 Marshall, Paule. *Brown Girl, Brownstones*. Old Westbury,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1981.
- Pitts, Candice A. "You Ain No Real-Real Bajan Man: *Brown Girl, Brownstones*, and the Measure of Caribbean Manhood in the North American Terrain." *CLA Journal* 59. 2 (2015): 166 - 176.
- Raynor, Deirdre J. and Butler, Johnnella E. "Morrison and the Critical Communit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ni Morrison*. Ed. Tally, Justine.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7. 175.
- Soja, Edward W. *Thirdspace —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 Tanritanir, Bulent Cercis and Boynukara, Hasan. "Letter-Writing as Voice of Women in Doris Lessing's *The Golden Notebook* and Alice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 *Ataturk U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Enstitusu Dergisi* 15. 1 (2001): 279 - 298.
- Washington, Mary Helen. "Afterword." *Brown Girl, Brownstones*.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1981. 311 - 324.
- Wilson, Harriet E. *Our Nig: Or, Sketches from the Life of a Free Blac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艾丽斯·沃克:《紫颜色》,陶洁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

高继海:“佩科拉悲剧探源——评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79—81页。

嵇敏:《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视域下的女性书写》,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

乔国强:“艾丽斯·沃克和她的《紫色》”,《妇女学苑》,1990年第1期,第38—39页。

申昌英:“社会空间的流浪者——评葆拉·马歇尔的《褐姑娘,褐砖房》”,《外国文学》,2007年第11期,第92—100页。

托妮·莫里森:《秀拉》,陈苏东、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a年。

一:《最蓝的眼睛》,陈苏东、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b年。

王影君:“论文学空间批评的美学源流”,《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90—197页。

王弋璇:“列斐伏尔与福柯在空间维度的思想对话”,《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0年第2期,第352—363页。

赵莉华:《空间政治》,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

赵罗英:“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及其启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0期,第36—38页。